

DOI: 10.19361/j.er.2022.02.05

# 惠人及己：对外援助与企业“走出去”

张克中 张文涛\*

**摘要：**发展援助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融资，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过程中提供了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新模式。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援助和企业“走出去”的客观事实考察了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基准回归发现，中国的对外援助推动了总出口的增加，对总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进一步考察出口和投资的结构，发现中间品出口和能源矿产投资受援助资金的影响较大。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援助资金对出口和投资的影响存在差异，官方发展援助对出口产生积极影响，而其他援助资金更有利于对外投资，并且，援助资金的影响在那些与中国发展合作联系密切的国家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部分发现，对外援助能够通过改善国家形象为出口和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推动企业“走出去”。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的对外援助有益于受援国福利改善，也给我国带来了经济收益和回报，这些发现为中国继续参与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

**关键词：**对外援助；国家形象；企业走出去

**中图分类号：**F811

## 一、引言

全球化促使商业活动突破地理的限制从而推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但全球化的扩张也导致国家之间发展不均衡，推动全球均衡发展成为迫切的全球性问题（UN, 2020; Egger et al., 2019）。国际发展合作是推动均衡发展的重要步骤，发展援助受到了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高度关注。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国际发展合作已经从政府层面的援助合作拓展到了企业层面的商业交流，通过更加广泛的援助资金带动贸易和投资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模式，这种模式被认为有助于改善受援国的福利状况（Vieira, 2019; 林毅夫、王燕, 2016; 郑宇, 2017）。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模式有效的前提是援助会推动出口和投资，但援助能否带动出口和投资仍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Martínez-Zarzoso et al., 2017; Liu and Tang, 2018）。本文研究了发展援助对企业出口和投资行为的影响，试图为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的有效性提

\* 张克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信箱：zkzdr@zuel.edu.cn；张文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430073，电子信箱：zwentaochina@163.com。

本文受到教育部、科技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项目编号：B20084）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基于全球公共经济学视角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研究”（项目编号：31512110909）的资助。另外，本文曾在首届香樟财政学论坛和567Seminar进行过报告，感谢与会人员、匿名审稿专家和《经济评论》编辑部的宝贵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供一定的经验证据。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实践为考察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模式有效性提供了良好的分析场景。中国是新型国际发展合作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正在推动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的转型。传统的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依赖于政府层面的援助合作,试图通过官方发展援助改善受援国的制度和治理能力,而新兴援助国则利用更加广泛的援助资金促进双边的商业联系,与受援国建立紧密的跨国发展伙伴关系,为受援国福利改善创造条件。新兴援助国的发展合作模式与传统援助国存在明显区别,传统援助国的援助是一种“垂直模式”,援助国会受援国提出要求和命令,受援国可能以损失政策独立性为代价来获取援助;新兴援助国在尊重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上所建立的“水平模式”,具有平等互惠的特点,更有助于传播国家形象,为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创造外部条件。

本文基于中国对外援助的客观事实,考察了对外援助对企业出口和海外投资的影响。本文的基准回归发现中国的对外援助增加了企业的总出口,但对总投资没有产生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考察不同类型的出口和投资后,发现这种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首先,将出口商品按照联合国统计局制定的广泛经济类别(BEC)划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后,发现中间品出口显著增加,资本品出口没有变化,而消费品出口显著减少。对外援助增加了中国中间品出口,受援国继续加工中间品为本地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品,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援助为何没有增加消费品出口,徐丽鹤等(2020)发现中国对外援助有助于推动受援国的工业化,从侧面为这个逻辑提供了证据。出口的结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的对外援助有助于改善受援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改善国家的福利水平。其次,将投资按照所属产业划分为农业投资、能源矿产投资和其他投资后,发现对外援助导致能源矿产投资的增加,农业投资没有明显的变化,其他投资出现了下降。能源矿产投资是对外投资的重点领域,通过资源开发推动经济增长也是处于早期发展阶段国家的必然选择,接受中国援助的中低收入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引进外资以促进经济增长。

进一步,本文还结合我国对外援助的特点从两方面考察了其异质性影响。其一,将援助资金按其构成划分为官方发展援助(ODA)和其他官方资金(OOF),发现基准回归中出口的结果主要是由 ODA 类型资金驱动,投资的结果主要取决于 OOF 类型的援助资金,OOF 类型资金能更清楚地捕获国家的动机。投资是一种更能体现国家战略的行为,这说明国家在援助的过程中也会结合自身的发展目标。其二,按照中国对特定国家的援助频率将受援国划分为高频率组和低频率组,发现对外援助对出口和投资的积极效果主要集中在那些接受中国援助频率更高的国家,这意味着发展领域的合作越频繁,援助资金对企业走出去的影响越显著。

最后,本文研究发现对外援助改善了中国国家形象,这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原因。基于传统援助国的研究发现对外援助所产生的基础设施效应是援助推动出口和投资的主要原因,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有助于提升受援国开展贸易和投资的能力。事实上,新兴经济体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所建立的“水平模式”不仅改善了受援国的基础设施状况,还与受援国结成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建立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从而为企业出口和海外投资提供便利。本文机制检验的结果发现对外援助的确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家形象,而且援助的效果主要存在于对我国国家形象持积极看法的样本中,如果一个国家认为我国国家形象比较负面,对外援助对于我国企业走出去没有显著的效应。进一步的,我们还考虑了其他可能的竞争性假说,对外援助可能通过基础设施效应或改善双边关系等途径推动企业出口和投资,实

证结果表明即使考虑这些潜在的因素,国家形象机制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边际贡献:一是本文的研究发现对外援助可能通过改善国家形象推动企业出口和投资,丰富了对外援助与企业海外市场行为机制的研究。已有研究发现对外援助能够通过基础设施效应(Infrastructure Effect)改善受援国吸收投资和开展贸易的能力,从而推进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Donaubauer et al., 2014; Vijil and Wagner, 2012),但这不足以解释为何受援国会增加源于援助国的出口和投资,而没有增加来自其他国家的出口和投资,本文研究进一步发现对外援助可以改善本国的国家形象,从而推动国内企业走出去。二是丰富了关于对外援助的经济动机和经济回报的研究。已有研究分析了美国、德国等传统援助国的对外援助对出口、投资总量的影响,试图说明对外援助所蕴含的经济目标(孙楚仁等, 2021; Otor and Dornan, 2017; Hühne et al., 2014),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出口和投资的结构,发现新兴援助国的对外援助较好地结合了自身经济收益和受援国发展目标,更有助于改善全球整体福利水平。三是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推动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成为当前经济双循环发展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的研究发现我国建立的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有助于推进企业走出去,为我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优化提供了参考。

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制度背景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是研究设计,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第五部分是机制分析,最后是结论和启示。

## 二、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 (一) 制度背景

国际发展合作是落实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对全球发展面临的贫困和不平等难题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拉大,贫困和不平等成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国际发展合作是实现全球发展再平衡的关键。发展援助作为国际发展合作的典型模式,能够推进受援国的能力建设,提升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改善受援国福利水平(郑宇, 2017)。进入新世纪以来,以中国为核心的新兴经济体进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发展合作体系,这些国家凭借新的援助理念重塑了现有国际发展援助规范(庞珣, 2013)。传统援助国的发展援助依赖于政府层面的援助合作,受援国为了获得援助国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失国家自主性。区别于传统援助国,新兴经济体将发展合作模式从政府层面的援助合作拓展到企业层面的商业交流,通过援助与贸易、投资相结合的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推动全球发展。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是一种水平模式,援助国在尊重受援国国家自主性的基础上展开合作,利用更加广泛的发展援助促进双边商业交流,带动企业出口和投资。

对外援助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方式。推动企业走出去就是要鼓励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将企业商业活动的范围向全球拓展,这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劳动力市场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陈昊、刘筹文, 2014)。对外援助能够为企业进入受援国市场创造良好的前期条件,对于中国继续参与全球化具有重要价值。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外援助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一是中国对外援助是一种典型的“项目制”,在基础设施、农业和工业等领域以成套项目为依托,为受援国经济增长创造条件;二是侧重“授人以渔”,传播发展知识和发展经验,提升受援国自主发展能力;三是坚持不附加政治条件,尊重受援国的国家自主性,建立负责任大国形象。一些研究发现中国的援助推动了受援国工业化进程(徐丽鹤等, 2020),通过中间品加工的方式将本国生产的消费品推向市场,这可能有助于中国的资本品和中间品出

口,但对消费品出口会存在挤出效应。发展援助为国内出口和投资创造了条件,也提升了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能力。

## (二) 理论分析

全球化通过改善企业商品和资本在全球范围的配置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在现实中,地理距离、国家政策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却构成了企业商业活动全球配置的挑战。为了打破商品和资本在全球流动的障碍,欧洲早期殖民国家利用火药和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建立大量殖民地以攫取全球资源,这种模式虽然帮助欧洲国家完成了工业化,但却对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增长造成了长期负面影响。区别于欧洲殖民者,中国参与全球化的方式存在差异,通过实施“援助-贸易-投资”三位一体的经济激励手段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以援助带动出口和投资的新型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着眼于建立长期的发展合作关系,将国际发展合作模式从政府层面的援助合作延伸到企业之间的商业合作,从而为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福利改善奠定基础(Vieira,2019;郑宇,2017)。理论上,发展援助可能通过“硬实力”和“软实力”两种渠道影响企业出口和投资。

发展援助可能通过提升“硬实力”渠道推动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发展援助所带来的“硬实力”主要包括两点:一是援助双方所签订的援助合约携带了相应的绑定条款,一个国家接收了援助资金就要以向援助国开放本国市场为代价。早期的援助多以“捆绑援助”(Tied Aid)的形式出现,援助国提供援助资金的条件就是受援国必须将这些资金用于购买援助国的产品和服务,因此,这种“捆绑援助”必然会导致援助国企业更多与受援国开展贸易、投资等经济活动。然而,随着国际发展合作的理念越来越深入,国际社会逐渐对“捆绑援助”进行“松绑”,“捆绑援助”慢慢退出国际援助体系,各国也难以通过“捆绑援助”的方式获得出口和投资方面的回报。二是援助过程中,受援国由于获得了援助资金能够提升本国开展贸易和投资的能力,从而有助于援助国的产品和资本进入受援国市场。一些研究表明,外部的发展援助能够帮助受援国建设和完善国内道路、电力等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外部的贸易和投资成本,提升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程度,这有助于援助国的企业向受援国进行出口和投资,文献中称之为基础设施效应(Donaubauer et al.,2014;Vijil and Wagner,2012)。总体而言,这两类情况下的对外援助都是以可观测的形式为援助国出口和投资提供便利,可以将这两类因素概括为“硬实力”。但在基础设施效应的逻辑下,受援国开展贸易和投资的基础设施完善后,所有其他国家都可能增加向这个国家的出口和投资,需要进一步探究为什么受援国市场会更加“偏爱”援助国企业。

发展援助也可能通过改善“软实力”机制推动企业出口和对外投资。事实上,企业商业活动能否顺利进入受援国市场还取决于受援国市场能否接纳来自援助国的商业活动,如果受援国对援助国国家形象持肯定评价,这对企业走出去会产生非常重要的正面影响。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指的是其他国家公民对于本国的看法和评价(宋弘等,2021)。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会带来诸多经贸利益,帮助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多竞争优势(Chang and Fujii,2013;Zhi et al.,2017;Chang et al.,2017);负面的国家形象可能会给国家造成经济损失(Heilmann,2016)。发展援助是改善本国海外国家形象的重要方式,较早的理论研究表明发展援助会使得受援国对援助国产生友善效应,后续研究表明对外援助能够帮助援助国在受援国建立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韩冬临、黄臻尔,2016;Goldsmith et al.,2014)。对外援助可以从两个方面改善援助国的国家形象:首先,援助国的人道主义援助在媒体传播

中处于更加突出的位置,这对于塑造援助国的国家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大量社会性和经济性基础设施项目会对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有助于吸纳当地闲置劳动力进入生产部门,为改善家庭经济创造条件,帮助援助国建立良好的国家形象。因此,对外援助可能通过改善国家形象,使受援国民众更加“偏爱”援助国的经贸活动,为企业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而推动企业走出去。

以国家形象为核心的软实力因素可能是中国对外援助推动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原因。首先,较之于传统援助国的对外援助,中国对外援助更有助于建设积极正面的国家形象。传统援助国的援助是“北南合作”模式,这种模式下的对外援助追求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的统一,通常带有附加政治条件和相应的考核条款,受援国接受援助在一定程度上要放弃国家独立性和政策自主性。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典型的“南南合作”模式,南南合作强调平等互利,追求互惠共赢,以尊重双方国家主权为前提,没有附加政治条款。南南合作提供了区别于传统援助国的新模式,研究发现南南合作比北南合作更具有发展属性,更有助于帮助受援国实现内生增长(徐丽鹤等,2020),从而帮助援助国建立积极的国家形象。其次,中国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十分注重国家形象建设。中国从全球视角思考责任担当,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等倡议,并依托这些机制开展对外援助工作,建设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最后,中国的对外援助具有良好的凸显性。中国的对外援助以“项目制”形式开展,以项目建设方式来改善当地经济社会环境,这种援助形式具有较高的凸显性,更有助于区域民众对中国形成正面主观态度。

### 三、研究设计

#### (一) 实证模型

对外援助作为国家政治经济行为的一部分,其支出规模和流向体现了国家的全球目标和政策动态。要想识别对外援助对企业走出去活动的影响,至少面临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两大挑战。一方面,对外援助和企业走出去活动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联系,中国更可能向主要出口市场或投资较多的东道国提供更多的发展援助,以增强两国的经济联系,这可能造成估计系数高估;另一方面,还可能存在一些无法观测的遗漏变量对因果识别造成干扰,例如,国家间利益的潜在冲突或者历史联系可能影响中国的援助行为,也可能影响两国的经贸往来。除此之外,本文所使用的援助数据来源于媒体公开信息,可能与中国实际援助支出存在差距。

为了识别对外援助对企业走出去行为的影响,我们建立了模型(1):

$$Y_{ij,t+1} = \beta_0 + \beta_1 Aid_{ij,t} + \beta X_{ij,t} + (S_{ij} \times f(t)) \cdot \theta + (X_{ij,t} \times f(r_{ij})) \cdot \delta + \delta_{ij} + \mu_i + Z_{j,t} + \varepsilon_{ij,t} \quad (1)$$

(1)式中: $i$ 表示国家, $j$ 表示*i*国所处的大洲, $t$ 表示年份。 $Y_{ij,t+1}$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中国在第*t*+1年对*j*洲*i*国的出口和投资。 $Aid_{ij,t}$ 为核心解释变量,定义为中国在第*t*年是否向*j*洲*i*国提供援助,中国提供援助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还利用中国在第*t*年对*i*国进行援助金额的对数形式进行回归。 $\varepsilon_{ij,t}$ 表示回归的残差项。

首先,为了解决识别中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我们对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进行了滞后一期处理,利用中国第*t*年对*i*国援助金额的对数对中国第*t*+1年对*i*国的出口和投资进行回归。

其次,潜在的遗漏变量仍然是我们识别中面临的一大挑战,为了克服这一难题,本文从

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工作:(1)本文在回归中控制了国家固定效应 $\delta_{ij}$ 和时间固定效应 $\mu_i$ ,控制国家固定效应用于捕获受援国国家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国家之间的固有差异对于识别的影响在回归中被吸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捕获受援国受到的共同的冲击,剔除了受援国共同面临的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回归模型的干扰。(2)我们还在回归中加入了一些随国家和时间变化的社会经济变量 $X_{ij,t}$ ,具体包括:GDP、人口、人口密度和自然资源等,试图消除市场潜力和自然资源等因素对我们的识别造成的偏差。(3)为了吸收一些区域性冲击可能对识别造成的干扰,我们在回归中还加入了洲和时间的联合固定效应 $Z_{j,t}$ 。(4)考虑到政体性质、民主程度、发展程度等变量的影响可能和时间并不是线性关系,我们加入了 $S_{ij} \times f(t)$ , $S_{ij}$ 表示政体性质、民主程度、发展程度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的集合, $f(t)$ 表示时间函数,具体包括时间趋势的一次项和二次项,试图消除这些变量在不同时间趋势层面的影响。最后,我们加入了 $X_{ij,t} \times f(r_{ij})$ , $f(r_{ij})$ 表示*i*国接受中国援助的概率函数,其取值不随时间改变,取决于*i*国接受源自中国援助的年数之和与样本期内总年数的比值,度量了一个国家接受中国援助的概率。

## (二)数据和指标

### 1. 企业走出去活动的的数据

本文所定义的企业走出去活动包括企业的出口和对外投资。出口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中国海关数据库,首先,为了便于观察中国各个年份对不同国家的出口情况,我们将企业出口数据按月份汇总到年份,剔除了数据中重复的样本,并按照年份和出口国对出口金额按美元计价进行加总处理;其次,为了进一步考察中国对各国不同类型商品的出口情况,根据商品的HS编码,利用联合国统计局制定的广泛经济类别(BEC)将中国对不同国家的出口按照最终用途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最后,将各年份中国对不同国家的出口信息合并,得到本文使用的出口数据。

投资的信息来源于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和遗产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共同发布的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China Global Investment Tracker)。这套数据详细记录了中国企业2005—2018年在全球的投资信息,具体内容包括:国家、金额(美元)、投资部门等。根据数据所提供的信息,首先,我们按照年份和国家对投资数据进行加总处理;其次,为了进一步考察投资的具体类型,我们根据数据提供的部门信息,将投资按照所属产业领域区分为农业投资、能源矿产投资和其他投资(主要是交通、房地产等基建类投资和金融投资),这种划分在主观上有助于我们考察对外援助的动机;最后,考虑到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可能存在的偏差,本文进一步手动搜集整理了2005—2016年对外投资统计公报的投资存量数据。

### 2. 援助数据

援助数据来源于威廉 & 玛丽女王学院研究实验室(Research Lab at William&Mary)所收集的中国全球官方援助数据集。该数据集采用严格可重复的方法,系统地搜集了中国在全球层面所资助的公开项目信息,最终汇总得到4 000余条中国各级政府资助的项目信息,具体的信息包括项目金额、所处国家、是否符合官方发展援助定义(ODA)等。在研究过程中,首先,根据数据集提供的信息,我们选择了可以用于研究的全部样本;其次,我们按照国家和年份对项目金额进行加总处理;最后,我们还进一步区分了资金的类型,根据数据集提供的信息按照年份和国家分别对符合ODA和OOF标准的资金分类加总。从而得到本文使用的

援助数据。

表 1 是对本文主要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出口和投资的相关指标以及援助金额均采用对数形式表示,是否接受援助为虚拟变量。

**表 1 主要变量的表述性统计**

变量名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总出口)	出口总金额的对数	2 444	18.711	5.218	0	27.09
ln(资本品出口)	资本品出口金额的对数	2 444	2.377	6.204	0	25.696
ln(中间品出口)	中间品出口金额的对数	2 444	7.771	9.486	0	25.734
ln(消费品出口)	消费品出口金额的对数	2 444	6.159	8.765	0	25.057
ln(总投资)	对外投资金额的对数	2 444	1.624	2.925	0	9.979
ln(农业投资)	农业投资金额的对数	2 444	0.059	0.577	0	7.621
ln(能源矿产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金额的对数	2 444	0.682	2.022	0	9.942
ln(其他投资)	其他投资金额的对数	2 444	0.764	2.03	0	8.809
是否获得援助	获得援助取值为 1,否则为 0	2 446	0.402	0.49	0	1
ln(援助金额)	获得中国援助总金额的对数	2 156	3.297	5.13	0	8.016

注:原始数据单位为千美元。

### 3. 国家形象数据

国家形象指的是其他国家民众对本国的看法和评价。本文的国家形象数据有两个来源:第一份关于国家形象的数据是非洲晴雨表(African Barometer)数据,2014年前后展开的第四轮调查中向受访民众询问了对中国的评价,例如在博茨瓦纳的调查中,问卷中提到“在您的观点中,请问您认为以下哪个国家可能是博茨瓦纳未来发展的最优模式?”我们从中提取了选择中国作为最优模式的受访者占该国样本总量的比重;除此之外,问卷中还提到“总的来说,您认为中国对博茨瓦纳的经济和政治影响主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同样的,我们提取了回答“非常好”和“比较好”的受访者比重。非洲晴雨表数据虽然比较系统地考察了非洲民众对中国的看法和评价,但是这份数据缺点是样本局限于非洲。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进一步搜集了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所提供的全球态度调查数据(Global Attitudes Survey),这份数据能够为我们提供 2005—2019 年全球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评价信息,我们从中提取了对中国进行积极评价人群的比例,但是这一数据的缺憾在于每一年调查的国家样本有限且不重复。为此,我们提取了两套数据中对中国持积极正面看法人群所占比例,持正面看法占比超过 50%定义为 1,否则为 0,生成国家形象指标。

### 4. 其他数据

本文控制变量的数据有多个来源:首先,本文从世界银行汇编的世界发展指标(WDI)数据库中选取了全球各国 GDP、人口、国土面积和自然资源等指标。其次,我们还使用了世界治理指标数据库(WGI)中的数据,试图控制受援国政府效率、政治稳定性、法律环境、政策质量和政治参与度等变量。除此之外,本文在控制变量度量中还利用政体数据库(Polity IV)中关于国家行政、民主的信息。最后,出于研究的需要,本文在研究的过程中手动整理了 2004—2015 年国家所处发展阶段、贸易协定、外交伙伴等级关系以及中外领导人互访信息。

## 四、实证结果

### (一) 基准结果分析

本文着重分析了对外援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表 2 给出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

果,第(1)列和第(5)列给出了总出口和总投资的回归结果,用于研究援助对企业走出去活动的总体影响,第(2)—(4)列将出口按照联合国统计局制定的广泛经济类别(BEC)进一步区分为资本品、中间品和消费品出口,第(6)—(8)列则将投资按照所属产业领域进一步划分为农业投资、能源矿产投资和其他投资,进一步考察对外援助对不同类型走出去活动影响的差异。所有的回归中,我们控制了经济规模、人口、人口密度和资源状况等基本变量,并加入了国家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区域和时间的联合固定效应。

表2 基准回归结果:对外援助对企业走出去活动的影响

被解释变量	(1)	(2)	(3)	(4)	(5)	(6)	(7)	(8)
	出口				投资			
	总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总投资	农业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	其他投资
<i>Aid</i>	0.230** (0.114)	0.386 (0.482)	2.008*** (0.692)	-1.821*** (0.621)	0.0810 (0.162)	0.0438 (0.0550)	0.539*** (0.147)	-0.462*** (0.16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基本特征×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受援概率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联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R^2$	0.188	0.059	0.041	0.040	0.165	0.044	0.059	0.110

注:括号内数字为稳健标准误,\*\*\*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1$ 。下同。

就出口而言,对外援助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出口。从表2的(1)—(4)列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中国的援助对企业出口总体上有积极的作用,但援助主要增加了中间品出口,对资本品出口影响不显著,对消费品出口甚至存在抑制作用。这个结果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援助在改善当地工业化水平后,受援国增加了对中间品的需求,通过本国加工生产成为消费品,进而降低了对消费品进口的需求。就投资而言,对外援助对投资总体效应不显著,但存在明显的结构差异。从表2的(5)—(8)列的回归结果来看,对外援助没有带来企业对外投资的显著增加,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并不显著。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的投资时,发现能源矿产投资明显增加,农业投资不显著,其他投资显著减少。这与受援国的发展阶段相符,中国的援助对象主要为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这些国家产业发展程度差,以自然资源的开发推动国家经济发展,因此,可以发现对外援助主要促进了中国企业的能源矿产投资。

## (二) 稳健性检验

### 1. 基于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借鉴 Dreher 等(2021),我们利用中国钢铁产量与各国接受中国援助概率的乘积以及中国向各国提供援助项目数量作为对外援助的工具变量,这两个变量都与中国对外援助密切相关,但在理论上不会直接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在考虑控制变量、受援国基本特征在不同时间维度的影响、受援国接受中国援助概率、国家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表3是基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Panel A 仅仅考虑了固定效应,不加控制变量;Panel B 加入了控制变量。从表3可以发现,总出口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总投资的系数仍然为正并变得显著,总体上,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较为类似。

表 3 基于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7)	(8)
	出口				投资			
	总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总投资	农业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	其他投资
Panel A: 不加控制变量								
<i>Aid</i>	0.395 (0.301)	0.154 (0.552)	2.716*** (0.814)	-2.825*** (0.703)	2.597*** (0.253)	0.135** (0.0558)	1.405*** (0.204)	0.809*** (0.212)
Observations	1 844	1 844	1 844	1 844	1 844	1 844	1 844	1 844
$R^2$	0.052	0.024	0.032	0.031	0.021	0.073	0.049	0.121
Panel B: 加入控制变量								
<i>Aid</i>	3.162*** (0.982)	0.0725 (1.853)	1.811 (3.744)	-2.364 (3.242)	2.999*** (0.948)	-0.0474 (0.193)	0.168 (1.005)	2.614** (1.108)
Observations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R^2$	0.261	0.050	0.053	0.078	0.282	0.054	0.198	-0.017
基本特征×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受援概率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联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Kleibergen-Paap F	11.28	11.28	11.28	11.28	11.28	11.28	11.28	11.28

## 2. 控制贸易和投资的滞后项

贸易和对外投资都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在基准回归结果中,我们没有加入贸易和投资的滞后项,这可能使基准回归的结果未能捕获到企业走出去活动在时间上的稳定性,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我们采取加入被解释变量滞后项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由于被解释变量是  $t+1$  期的结果,我们分别采取了加入被解释变量当期、滞后一期、滞后两期以及同时加入三个滞后期的方式,考察结论的稳健性,不同添加方式得出的结论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表 4 汇报了采取最为严格的回归结果,即在回归中同时加入被解释变量的当期、滞后一期和滞后两期。从表 4 可以发现,尽管我们在回归中,考虑了企业走出去活动的稳定性,基本回归结果不会发生改变,对外援助显著推动了企业出口,尤其是中间品出口,以及能源矿产投资。

表 4 稳健性检验:控制贸易和投资的滞后项

	(1)	(2)	(3)	(4)	(5)	(6)	(7)	(8)
	出口				投资			
	总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总投资	农业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	其他投资
<i>Aid</i>	0.285* (0.148)	-0.0701 (0.543)	1.989*** (0.738)	-1.331** (0.635)	0.141 (0.195)	0.0312 (0.0670)	0.564*** (0.173)	-0.417** (0.189)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基本特征×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受援概率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联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Lag(0)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Lag(1)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Lag(2)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 146	1 146	1 146	1 146	1 146	1 146	1 146	1 146
$R^2$	0.423	0.108	0.105	0.104	0.126	0.080	0.094	0.116

3.排除其他国家援助的影响

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国家更容易接受来自其他国家的援助,如果一个国家因为获得了更多的国际援助而更有能力购买来自中国的出口产品,就会导致基准回归中中国对外援助作用的高估,甚至导致基准回归结果的结论完全错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在研究设计上予以考虑,一是在控制变量中考虑了受援国的经济规模、人口等社会经济变量,二是在回归中加入了国家基本特征与时间趋势的交乘项。其次,我们在表5的稳健性检验部分直接控制了受援国获得的中国以外的国际发展援助资金总量(*Otheraid*)。从表5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即使考虑了受援国获得的发展援助资金总量,回归结果也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表5 稳健性检验:控制其他国家的援助

	(1)	(2)	(3)	(4)	(5)	(6)	(7)	(8)
	出口				投资			
	总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总投资	农业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	其他投资
<i>Aid</i>	0.248* (0.136)	0.123 (0.521)	2.544*** (0.796)	-1.956*** (0.715)	0.00937 (0.181)	0.0519 (0.0656)	0.564*** (0.161)	-0.584*** (0.186)
<i>Otheraid</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基本特征×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受援概率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联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982	982	982	982	982	982	982	982
<i>R</i> <sup>2</sup>	0.193	0.096	0.060	0.063	0.185	0.032	0.075	0.121

4.加入受援国的制度层面因素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在基准回归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了诸多因素,但受援国制度因素也可能对中国援助以及企业走出去产生影响。如果一个国家虽然发展水平较低,但社会制度比较完善,拥有负责任的政府、稳定的政治和相对比较健全的法治体系,那么这个国家更可能成为国际援助的流入地,同时也更容易获得国际流动资本的青睐。为了考虑受援国社会制度层面因素可能对基准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我们进一步控制了世界治理指标(*WGI*)的六个指标。从表6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即使进一步考虑了社会制度层面的因素,基准回归中的结论仍然不会受到影响,这表明制度层面的因素不会影响我们的结论。

表6 稳健性检验:控制世界治理指标

	(1)	(2)	(3)	(4)	(5)	(6)	(7)	(8)
	出口				投资			
	总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总投资	农业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	其他投资
<i>Aid</i>	0.208* (0.109)	0.314 (0.504)	2.145*** (0.715)	-1.896*** (0.633)	0.0471 (0.167)	0.0444 (0.0563)	0.526*** (0.151)	-0.479*** (0.167)
<i>WGI</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基本特征×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受援概率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联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 417	1 417	1 417	1 417	1 417	1 417	1 417	1 417
<i>R</i> <sup>2</sup>	0.192	0.067	0.047	0.044	0.171	0.044	0.063	0.113

### 5. 考虑其他维度冲击的影响

在前文的回归中,虽然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消除了国家的固有差异以及国家在不同时期面临的共同冲击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但是,如果这些共同冲击对不同国家的影响存在差异,国家和区域固定效应就无法完全捕获这些冲击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利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这一模型充分考虑了现实经济中容易存在的多维冲击,允许不同国家对这些冲击存在不同的反应。表7给出了利用交互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文章核心结论依然稳健可靠。

表7 稳健性检验:交互固定效应

	(1)	(2)	(3)	(4)	(5)	(6)	(7)	(8)
	出口				投资			
	总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总投资	农业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	其他投资
<i>Aid</i>	0.178*** (0.0565)	0.299 (0.517)	2.044*** (0.777)	-1.657** (0.714)	-0.0991 (0.191)	0.0137 (0.0540)	0.544*** (0.161)	-0.399** (0.161)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基本特征×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受援概率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交互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Observations	1 425	1 425	1 425	1 425	1 425	1 425	1 425	1 425

### 6. 其他稳健性检验

除上述稳健性检验外,我们还从变量定义、数据等方面进行了考虑。首先,为了避免基准回归结果仅仅是数据结构的巧合,我们遵循安慰剂检验的思路,利用当期的援助对提前两期和提前四期的出口与投资进行回归,发现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其次,我们改变援助的定义方式,直接利用援助金额的对数对结果变量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最后,我们从BACI数据库(International Trade Database at the Product-Level)中按照年份和国家加总提取了出口总量信息,从2005—2016年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中搜集中国对全球各国的投资存量数据,利用新数据得出的结论与基准回归类似<sup>①</sup>。

#### (三) 异质性分析

本文研究了中国对外援助对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影响,前文的回归结果已经证明对外援助能够推动企业出口和投资,尤其是中间品出口和能源矿产投资。接下来,结合我国援助的特点,从异质性分析角度去讨论援助效果的差异。

##### 1. 不同援助类型的影响

在传统的发展援助的框架内,援助资金通常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官方发展援助(ODA),另一类是其他官方资金(OOF)。通常而言,ODA类型的资金被认为更有优惠性质,而OOF类型的资金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援助国家的目标。为了考察不同类型援助资金对企业走出去活动影响的差异,我们将援助资金划分为ODA类型资金和OOF类型资金,分别对企业出口和投资变量进行回归,表8给出了不同类型援助资金的回归结果。

表8的Panel A是ODA类型资金的回归结果,Panel B是OOF类型资金的回归结果,

<sup>①</sup>篇幅限制,本部分的结果未在正文中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Panel C 的回归中同时加入了 ODA 和 OOF 类型的资金。从表 8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 Panel A 中, ODA 类型的资金对出口会产生显著影响; Panel B 中, OOF 类型资金对企业投资存在比较明显的积极作用; Panel C 的估计结果与 Panel A 和 Panel B 一致。这表明我国在提供对外援助的过程中, 不仅通过贸易提升了受援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和分工, 同时也会考虑我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需要。

表 8 异质性分析: 不同类型援助资金

	(1)	(2)	(3)	(4)	(5)	(6)	(7)	(8)
	出口				投资			
	总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总投资	农业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	其他投资
Panel A: ODA 类型资金								
ODA	0.0251* (0.0144)	-0.0413 (0.0541)	0.228*** (0.0778)	-0.167** (0.0705)	-0.00904 (0.0189)	-0.000829 (0.00560)	0.00448 (0.0183)	-0.0141 (0.0177)
Observations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R <sup>2</sup>	0.188	0.059	0.043	0.039	0.165	0.043	0.051	0.104
Panel B: OOF 类型资金								
OOF	-0.00314 (0.00698)	0.0585 (0.0747)	0.0819 (0.105)	-0.0507 (0.0873)	0.0442** (0.0200)	0.00371 (0.00927)	0.0849*** (0.0286)	-0.0397 (0.0246)
Observations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R <sup>2</sup>	0.186	0.059	0.037	0.035	0.167	0.044	0.064	0.107
Panel C: ODA+OOF 类型资金								
ODA	0.0259* (0.0152)	-0.0324 (0.0539)	0.256*** (0.0763)	-0.186** (0.0724)	-0.00110 (0.0193)	-0.000168 (0.00567)	0.0209 (0.0181)	-0.0224 (0.0182)
OOF	0.00426 (0.00863)	0.0493 (0.0744)	0.155 (0.104)	-0.104 (0.0897)	0.0439** (0.0203)	0.00366 (0.00945)	0.0909*** (0.0277)	-0.0461* (0.0244)
Observations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1 427
R <sup>2</sup>	0.188	0.060	0.044	0.040	0.167	0.044	0.065	0.10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基本特征×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受援概率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联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2. 接受中国援助概率的影响

不同国家接受中国援助的概率存在差异, 一些国家可能每年都会接受来自中国的援助, 还有一些国家在某些年份可能不会接受到中国的援助, 接受中国援助的频率越高, 说明两国在国际发展领域的合作越频繁。在表 9 的回归中, 利用各国接受中国援助概率均值, 将样本中的国家分为高概率组和低概率组, 分别考察对外援助对企业出口和投资的影响。表 9 中, Panel A 是利用援助概率高于均值的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 Panel B 是利用援助概率低于均值的样本进行回归得到的结果, 高概率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较为类似, 而低概率组回归结果不显著。这说明在国际发展领域与中国合作紧密的国家通常也伴随着更强的商业联系, 会有更多的中国产品和资本进入该国市场。对于中国而言, 寻求建立稳定的发展合作关

系,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具有积极意义。

**表 9 异质性分析:不同援助概率影响的差异**

	(1)	(2)	(3)	(4)	(5)	(6)	(7)	(8)
	出口				投资			
	总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总投资	农业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	其他投资
Panel A:高概率组								
<i>Aid</i>	0.250 (0.178)	0.120 (0.635)	1.723** (0.824)	-1.322 (0.808)	0.299 (0.193)	0.0111 (0.0750)	0.833*** (0.179)	-0.499** (0.211)
Observations	651	651	651	651	651	651	651	651
$R^2$	0.196	0.124	0.073	0.076	0.223	0.050	0.119	0.163
Panel B:低概率组								
<i>Aid</i>	0.0885 (0.0574)	0.849 (0.888)	1.824 (1.433)	-2.201** (1.077)	-0.200 (0.310)	0.0793 (0.0796)	0.0922 (0.224)	-0.329 (0.289)
Observations	776	776	776	776	776	776	776	776
$R^2$	0.738	0.087	0.082	0.068	0.187	0.113	0.115	0.12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基本特征×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受援概率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联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五、机制检验

对外援助为什么推动了企业的出口和投资?已有研究指出对外援助能够帮助受援国完善与贸易和投资有关的基础设施,这种基础设施效应可能是企业出口和投资的原因。但为什么受援国会更加偏好来自援助国的商业活动,一些研究认为援助国的援助行为能在受援国产生善意效应,这可能导致受援国更加偏好来自援助国的商业活动。事实上,结合前面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至少可以表明企业商业活动更容易流向发展合作关系比较紧密的国家,紧密的发展合作可能为中国在当地创造良好的国家形象。

### (一) 国家形象机制

国家形象指的是其他国家对本国的看法和评价(Chang and Fujii,2013)。在当今国际事务中,国家形象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一个国家发展模式的认可和对其政治经济影响的判断深刻体现了这个国家所建立的国家形象。为了建立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中国依托对外援助广泛参与国际发展合作,让中国经济增长惠及全球经济发展程度仍然较低的国家。

中国对外援助项目建设过程传播了中国发展经验,也为中国在受援国创造了良好的国家形象。图 1 展示的对外援助与国家形象之间的关系说明对外援助能够提升中国在受援国的国家形象,其中,横轴表示某个国家所接收到的源自中国的援助金额,纵轴表示受援国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比值越高意味着国家形象更加积极正面。前三个图的数据来自非洲晴雨表数据库,Panel A 的纵轴表示受援国民众认为“中国是本国最佳发展模式”的调研对象占比,Panel B 的纵轴表示认为“中国经济活动影响最大”的人群占比,Panel C 的纵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非常好和一般好”的受访者占比;Panel D 的数据来自全球态度调查数

据,纵轴表示对中国国家形象持积极评价人口所占比例。图1表明对外援助与国家形象之间是正向关系,基于回归的结果也表明对外援助与中国国家形象呈现正向关系<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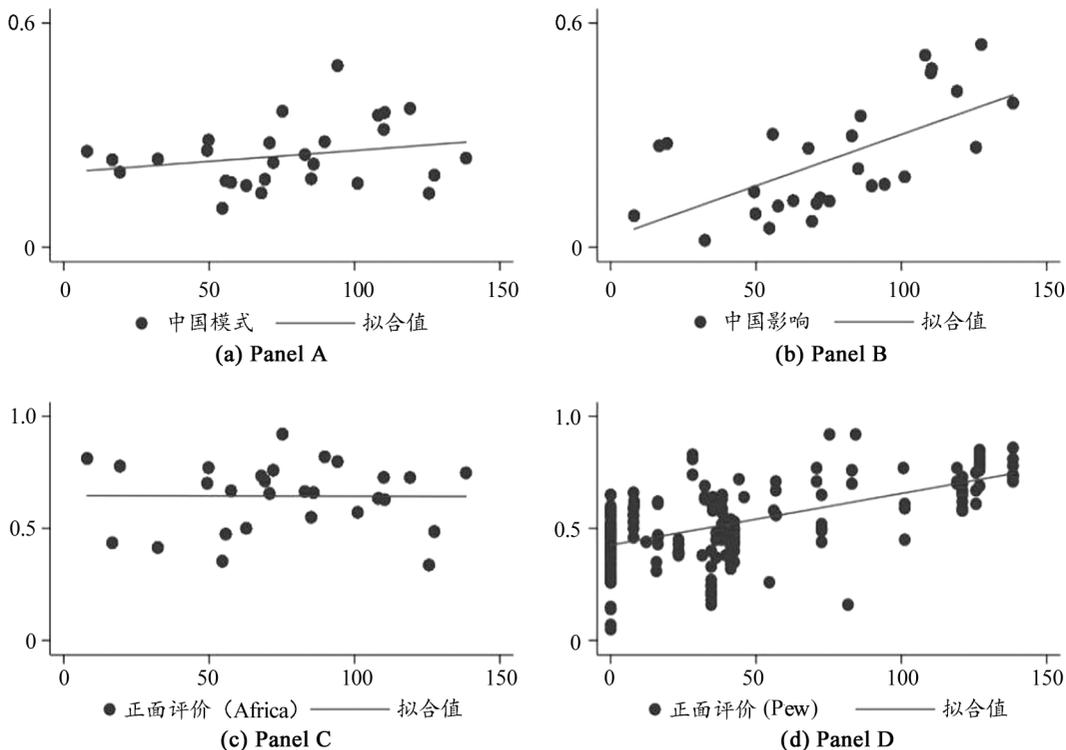


图1 对外援助与中国国家形象

事实上,无论是非洲晴雨表数据还是全球态度调查数据,其样本量都较为有限,也不是追踪调查。为了克服这个问题,我们将非洲晴雨表中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影响非常好和一般好”受访者占比和全球态度调查中认为“中国的国家形象非常积极正面”人群占比合并,从而扩大样本量,得到后续使用的国家形象指标。将两个来源的国家形象数据合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样本不足的缺憾,但也可能带来样本的缺失值的系统性偏差问题,我们首先对这一问题进行检验,只要数据缺失与本文的核心变量无关就可以排除这种担忧,检验结果表明这种数据缺失并非是系统性问题<sup>②</sup>。

利用国家形象指标进行分样本检验,发现对外援助可以通过在受援国为中国建立更好的国家形象从而推动企业出口和投资。尽管将两套数据合并从而构建国家形象度量指标,但考虑到国家形象指标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缺失问题,无法将其直接加入面板回归中,本文退而求其次,选择了分组检验的方法。如果某个国家积极评价占比超过50%,就可以近似认为在这个国家中国国家形象较为正面,否则就比较负面。表10给出了本文机制检验的回归结果,Panel A是利用对中国积极评价高于50%的国家样本所进行的回归,Panel B的回归样本是对中国积极评价低于50%的样本。研究发现基准回归的结论主要存在于积极印象的样

①出于篇幅考虑,此处结果未在正文中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②出于篇幅考虑,此处结果未在正文中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本里,这意味着中国在受援国所建立的国家形象对于企业走出去十分重要。

**表 10 机制检验:国家形象**

	(1)	(2)	(3)	(4)	(5)	(6)	(7)	(8)
	出口				投资			
	总出口	资本品	中间品	消费品	总投资	农业投资	能源矿产投资	其他投资
Panel A:积极印象								
<i>Aid</i>	0.246 * (0.132)	0.328 (0.525)	1.986 *** (0.751)	-1.744 ** (0.687)	0.207 (0.174)	0.0194 (0.0571)	0.573 *** (0.150)	-0.347 ** (0.168)
Observations	1 199	1 199	1 199	1 199	1 199	1 199	1 199	1 199
$R^2$	0.189	0.069	0.046	0.055	0.170	0.052	0.066	0.110
Panel B:消极印象								
<i>Aid</i>	-0.0238 (0.0611)	2.133 * (1.070)	0.356 (2.169)	-2.271 (1.582)	-0.713 (0.417)	0.0464 (0.166)	0.490 (0.599)	-1.255 ** (0.502)
Observations	218	218	218	218	218	218	218	218
$R^2$	0.823	0.299	0.277	0.206	0.364	0.261	0.234	0.35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基本特征×时间趋势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控制变量×受援概率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国家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联合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 (二) 替代性机制排除

在本文的逻辑下,对外援助推动企业出口和投资的重要原因是改善了中国在受援国的国家形象。但必须承认,这一解释也可能受到其他竞争性假设的影响,本文的目的并非是要去排除这些潜在机制的存在,而是试图证明对外援助的确会通过改善国家形象从而推动企业走出去。因此,我们可以假设这些机制在现实中可能都会发挥作用,但只要在考虑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国家形象的影响依然存在,就能达到本文的目标。首先考虑了基础设施效应,继续控制了受援国发电量、进口耗时、贸易协定和进口关税等指标,发现即使考虑基础设施效应,国家形象的影响依然存在;其次考虑双边关系的影响,我们在回归中引入了外交伙伴关系等级、中国领导人出访和外国领导人来访三个指标,发现国家形象的效果依然稳健。最后,还可能存在一些文化和制度层面的遗漏变量影响本文对机制的解释,但我们发现国家形象依然会产生重要的影响<sup>①</sup>。

## 六、结论与启示

国际发展合作是应对全球发展不均衡挑战的重要途径,新兴经济体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过程中创造了新的合作模式,将发展合作从政府层面的援助合作拓展到企业层面的商业交流,以援助带动贸易和投资是新型发展合作的显著特征。本文考察了中国对外援助对企业走出去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援助推动了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和能源矿产投资,结合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和主要受援国的发展阶段,可以发现这种出口和投资的变化既体现了

<sup>①</sup>篇幅限制,本部分回归结果未在正文中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又与受援国的发展需求相符合,有助于提升受援国的发展能力。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国家形象改善是对外援助带来出口和投资变化的重要原因,我国的对外援助改善了我国的国家形象,从而推动了企业走出去。

本文的发现为驳斥国内外对我国对外援助的质疑提供了证据。长期以来,中国的对外援助遭受国内外的质疑和批评,一些国内的观点认为对外援助与国家发展目标相悖,没有实质的回报和收益,国外的一些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的“外交政策工具”。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对外援助为中国带来了实质的经济收益,并非是一种不计成本的国家行为;同时,对外援助作为中国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依托,为受援国发展能力建设和全球分工改善提供了支撑,具有比较明显的发展性质。

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有待于未来的研究继续补充完善。一是受限于研究的数据,对国家形象的度量仍然比较粗糙,如果未来有更为完整的追踪数据集,可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二是本文为新型发展合作改善受援国福利状况提供了初步的证据,但是并没有估算福利变化的量,这需要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索。

#### 参考文献:

- 1.陈昊、刘骞文,2014:《中国出口贸易的女性就业效应:基于筛选-匹配模型的再检验》,《经济评论》第1期。
- 2.韩冬临、黄臻尔,2016:《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国的对非援助》,《世界经济与政治》第6期。
- 3.林毅夫、王燕,2016:《超越发展援助——在一个多极世界中重构发展合作新理念》,北京大学出版社。
- 4.庞珣,2013:《新兴援助国的“兴”与“新”——垂直范式与水平范式的实证比较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第5期。
- 5.宋弘、罗长远、栗雅欣,2021:《对外开放新局面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研究》,《经济学(季刊)》第21卷第1期。
- 6.孙楚仁、何茹、刘雅莹,2021:《对非援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工业经济》第3期。
- 7.徐丽鹤、吴万吉、孙楚仁,2020:《谁的援助更有利于非洲工业发展:中国还是美国》,《世界经济》第11期。
- 8.郑宇,2017:《援助有效性与新型发展合作模式构想》,《世界经济与政治》第8期。
- 9.Chang, P.L., and T.Fujii. 2013. “Country Ima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115998](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115998).
- 10.Chang, P.L., T.Fujii, and W.Jin. 2017. “Does ‘America First’ Help America? The Impact of Country Image on Exports and Welfare.”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https://ink.library.smu.edu.sg/soe\\_research/2138/](https://ink.library.smu.edu.sg/soe_research/2138/).
- 11.Donaubauer, J., B. Meyer, and P. Nunnenkamp. 2014. “Aid, Infrastructure, and FDI: Assessing the Transmission Channel with a New Index of Infrastructure.” *World Development* 78(C): 230-245.
- 12.Dreher, Axel, Andreas Fuchs, Bradley Parks, Austin Strange, and Michael J.Tierney.2021. “Aid, China, and Growth: Evidence from a New Global Development Finance Dataset.”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13 (2): 135-74.
- 13.Egger, Peter H., Sergey Nigai, and Nora M.Strecker.2019. “The Taxing Deed of Glob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9 (2): 353-90.
- 14.Goldsmith, B. E, Y. Horiuchi, and T. Wood.2014. “Doing Well by Doing Good: The Impact of Foreign Aid on Foreign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9(1): 87-114.
- 15.Heilmann, K. 2016. “Does Political Conflict Hurt Trade? Evidence from Consumer Boycot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99(3):179–191.

16. Hühne, P., B. Meyer, and P. Nunnenkamp. 2014. “Who Benefits from Aid for Trade? Comparing the Effects on Recipient versus Donor Export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50(9):1275–1288.
17. Liu, A., and B. Tang. 2018. “US and China Aid to Africa: Impact on the Donor–recipient Trade Relations.” *China Economic Review* 48(10):46–65.
18. Martínez–Zarzoso, Inmaculada, Felicitas Nowak–Lehmann D., and Kai Rehwald. 2017. “Is Aid for Trade Effective? A Panel Quantile Regression Approach.” *Revi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21(4):175–203.
19. Otor, S.A., and M. Dornan. 2017. “How Does Foreign Aid Impact Australian Exports in the Long–Run?”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https://crawford.anu.edu.au/publication/crawford-school-working-papers/11701>.
20. United Nations. 2020. *UN Secretary–General Releases 2020 SDG Progress Report*. United Nations: New York.
21. Vieira, V. 2019. “From Third World Theory to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ernational Aid as a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ool.” *Contexto Internacional* 41(3):529–551.
22. Vijil, M., and L. Wagner. 2012. “Does Aid for Trade Enhance Export Performance? Investigating the Infrastructure Channel.” *World Economy* 35(7):838–868.
23. Zhi, Y., D. Bao, and C. Luo. 2017. “Economic Value of Country Imag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25(3):87–111.

## Helping Others Is Helping Ourselves: Foreign Aid and Enterprises Going–out

Zhang Kezhong and Zhang Wentao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Abstract:** Development aid provides financing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emerging economies provide a new model that combines aid with trade and investmen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is model based on the objective reality of Chinese foreign aid and enterprises going–out.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finds that foreign aid has promoted the increase of total exports, but has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otal investment. Further investigation on the structure of export and investment shows that intermediate product exports and investment in energy and mineral resources are greatly affected by the aid funds.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es show tha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aid funds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export and investment. Official development ai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xports, while other aid funds are more conducive to foreign investment. Moreover, the impact of aid funding is more obvious in countries with close ties to China’s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foreign aid has created a good external environment for the export and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by improving the image of the country and promoting enterprises to “go out”.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show that Chinese foreign aid is beneficial to the welfare improvement of recipient countries, and it also brings economic benefits and returns to our country. These findings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upport for China’s continued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Keywords:** Foreign Aid, Country Image, Enterprises Going–out

**JEL Classification:** F10, H00, O50

(责任编辑:陈永清)